

正确理解道德文化

江 畅 赛尚琪

摘 要 道德文化是社会主导道德观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或现实化,体现为道德心态、道德行为、道德制度、道德物态等不同层面,是构成整个社会文化核心内容的善化文化。道德文化对于人类更好生存、社会道德个人道德的生成运行以及社会的精神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道德文化能为个人道德修养提供丰富养分,也是社会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底色。道德文化的先进性体现为真理性和时代性,其真理性在于,它体现了道德法则的要求,即每一个道德主体都应在谋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无损且有益于他者;其时代性指的是道德文化渗透、弥漫的某个特定时代的道德本质特征,具体体现为道德文化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社会成员愿意将其道德要求转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道德文化是社会道德控制的结果,只有以正确的道德观为依据,实行道德控制才能形成先进的道德文化。

关键词 道德文化;道德观;道德先进性;道德法则;道德控制

中图分类号 B82-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2-0077-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023)

如同文化是价值观的体现一般,道德文化同样是道德观的体现和现实化。道德观是“人基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品质、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价值观念而自发形成或自觉构建的观念道德体系”^[1](P77),道德文化是社会实行道德控制的结果。当人类开始自觉地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对道德文化也就开始了有意识的建设。但这种有意识的建设仍然属于社会的道德控制范畴。道德文化是从道德一诞生就自然形成的,自古以来人类有许多道德文化形态,它们的存在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从道德控制有效性的角度看,道德文化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其决定因素是作为灵魂的道德观念是否正确。道德文化是构成整个社会文化核心内容的善化文化,对社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学者对道德文化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以便深化人们对道德文化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讨论“道德文化”的概念入手,对道德文化作一个概要性的阐释,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一、道德文化与道德观

“道德文化”一词人们用得比较多,但人们对道德文化的理解还有不少分歧。从中国知网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早专门研究道德文化的论文是夏伟东的《论道德文化的承接》一文。这篇文章主要研究传统的或外来的道德文化的“承接”问题,“承接”的意思大致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传承和创新,但该文中花了一定的篇幅来阐述什么是道德文化。这是我国首次系统阐述什么是道德文化的文章,因而我们就从该文切入,讨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理解道德文化。

该文所说的道德文化是指把道德当作一类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从与政治、经济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道德,也就是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道德现象总体。作者根据这个思路,从两个方面

来理解作为文化的道德现象。一方面,从高层道德文化上来理解道德,即从明确的有文字记载的道德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道德。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其主干就是各个时期的道德哲学——伦理学。另一方面,从底层道德文化上来理解道德,即从道德心理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这些道德心理往往是那些高层道德文化长期进行文化熏陶的结果,是理论的东西在潜意识中的积淀^[2]。这篇文章分两个层次理解道德文化,是因为它根据张岱年的观点,把文化看作既与政治、经济相连又与政治、经济相区别的那些东西,并且把文化进一步分解为高层文化(主要由文字载体表达出来)和底层文化(主要不是由文字载体表达出来而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社会心理”)。因而把道德现象当作一类文化、从文化而不是从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理解道德,并将道德文化划分为道德哲学和社会心理两个层面,是很有见地且有学术深度的。尽管夏伟东先生的见解颇具启发性,但若真正把道德文化的实质,还必须从真正意义上道德哲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对道德文化的理解。

首先,道德文化不只是一类文化,而是文化中的核心,并且是政治文化、精神文化^①的母体和酵母。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化,即“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3](P26)。这里所说的价值观念并不是指任何价值观念,而是那种社会的根本性总体性的价值观念,即价值观。广义的文化就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因而可以根据社会生活领域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从我国目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看,社会的文化应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生态五个方面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则是指“观念形态文化”,“它与特定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构成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作为信息的传播及保存系统,具有知识性特征,它是对广义文化的记载”^[3](P29)。狭义的文化是作为社会一个领域那种意义上的文化(以下简称“社会文化”)。道德文化无疑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它还涉及社会成员活动的规范和追求的引导,因而在社会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直接关乎社会的秩序和美好,关乎社会成员个人的发展和幸福。在社会文化中,除了道德文化之外,还有精神文化。广义的精神文化大致上与社会文化同义,因为社会文化几乎都是精神性的东西,其现实体现就是精神文明。狭义的精神文化则是道德文化中的高层次文化,即道德文化中引导追求部分的强化。这种精神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基础,没有道德文化就没有社会中属于广义文化的政治文化,其中的规范文化可视为道德文化中规范部分的强化。道德文化的规范部分和引导部分被强化后,就不再完全属于道德文化。虽然政治文化、精神文化与道德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交叉关系,但它们都源自道德文化,而且都以道德文化为基础。这种关系既是母子关系,又是根基与建筑物的关系,没有道德,社会中的一切文化都不复存在。

其次,道德文化并不只有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两个层面,而是除此之外还有道德制度和道德行为层面。对于文化的结构历来有不同的划分,其中有一种划分是比较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这就是把文化划分为心态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3](P33)。夏伟东在《论道德文化的承接》一文中所说的道德文化的两个层面属于道德心态文化,而且道德心态文化的高层次不只是道德哲学,还包括其他方面。比如说,在道德哲学产生前的两千多年的文明社会,没有道德哲学,但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社会的道德观念系统。即使在现代社会,一些小且落后的国家也许没有道德哲学,但有包含道德观念的系统。道德文化肯定包含行为方面,人们通过礼俗、民俗和风俗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构成了道德文化的行为文化层。道德制度文化也无疑是存在的,最典型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制。周公对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礼仪及传统习俗予以整理、补充和改造,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制定出一套维护和保障宗法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以及国家治理过程中需要的典章规定和礼节仪式,将“礼”的仪式性提升为“礼”的制度^[4]。这种“礼”在西周指的道德规范,这一点从“义而行之,谓之德、礼”(《左传·文公七年》)、“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宣公十二年》)等表述可以看出。道德文化也有物态文化,

① 这里指的狭义的精神文化,在现代中国语境中,广义的精神文化是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的,包括政治文化、生态文化。

孔庙就可以说是物态的道德文化。孔庙都是为纪念和表彰作为“万世师表”“千古圣人”的孔子修建的,被赋予丰富的道德意蕴。孔子歿后,首先立庙于今山东曲阜孔子故里,为本庙;汉代以后又相继在京都及地方学校、书院等立庙。由于朝代更换等原因,为都之地屡有变迁,然孔庙之设相沿不断,建制规格越来越高。孔庙之设多带有连续性,形成了许多千年古庙,各具特色。作为物态的道德文化,孔庙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道德场域”。它通过庄严的建筑、神圣的仪式和历史的记忆,无声地诉说着尊师重道、崇德尚贤的价值理念,使参观者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受到道德熏陶,这正是道德文化“以善化人”功能的空间化体现。像政治文化一样,道德文化是文明社会中一个社会领域的文化,有物态、制度、行为和心态四个层面。

最后,道德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体现某种道德观的文化,而不能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道德。我们通常说的从某角度来理解某事物,某事物通常不是某角度本身。比如,我们说从文化的角度理解经济或政治,那意味着文化不是经济或政治。道德本身就是文化,而不是像经济和政治那样整体上不是文化,只是其中有文化的层面。道德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前文谈到,文化是人类价值观念(价值观)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而道德则是人类道德观念尤其是作为其集中体现的道德观的对象化。这种对象化其实就是现实化,是把观念的东西变成实际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观既是价值观的基础和母体,又是价值观的实质和核心,任何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观都受制于道德观”^[1](P77)。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一体到分享的过程。在原始社会,道德观就是价值观,社会的道德体系就是价值体系,而到了文明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从原始社会的道德观、道德体系产生了许多超出道德范畴的新价值内涵和价值子系统,道德观便退隐成为价值观的基础和内核。因此,我们不是要从文化来理解道德文化,而是要从道德观来理解道德文化。这样来理解道德文化,我们才能把握道德文化的实质,才能洞察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道德文化的实然本质或现实本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重新给道德文化下一个定义。所谓道德文化,就是社会主导道德观在社会道德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或现实化,体现为道德心态、道德行为、道德制度、道德物态等不同层面,构成整个社会文化核心内容的善化文化。道德文化是道德观的对象化,而道德观是关于道德的观念。道德的价值取向是善,追求的是至善,因此,道德观念就是求善的观念,是追求至善的观念。作为这种观念对象化的道德文化就是善化文化,就是善性文化。实现善化必须向善、尚善、知善、求善、守善、扬善,而这一切正是道德文化的实质意蕴。

这种对象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实化过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着重把握。

第一,道德文化不是任何一种道德观的现实化,也不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道德观的现实化,而只能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近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从封闭专制的社会走向开放民主的社会,同一个社会内部的道德观也从过去的一元走向多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道德文化也存在着多元因素,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文化总是某种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例如,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有很多人信奉天主教道德观,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宗教的道德观,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功利主义道德观。虽然功利主义道德观不是西方国家倡导的,却是在西方国家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功利主义更反映了西方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而其原则为西方近现代社会所实际奉行”^[5](P34)。普遍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意味着西方人普遍奉行功利主义道德观。西方道德文化也不是天主教道德观和功利主义道德观及其他道德观的整合,而只能是功利主义的道德文化。这就如同当代中国虽然有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不同表达,也有功利主义及其他道德观的论述,但中国的道德文化就是社会主义道德文化。

第二,在道德观现实化的过程中,社会主导道德观与道德文化是一个相互生成的过程。从逻辑上看,一个社会应道德观在先,然后将道德观运用于社会生活,从而形成社会的道德文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轴心时代以后,社会的主导道德观通常来自某种道德理论,但社会治理者在使它变成社会主导道德观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道德文化的建设过程。就是说,虽然某种道德理论是社会道德文化的切入

口,但这种道德理论在运用的同时也产生了道德文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道德的其他因素(道德教育、道德褒贬、道德整治)协同作用,而这就是构建道德文化形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文明社会,道德观的重新确立不可避免地会以文化传统作为土壤,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社会已存在的道德文化因素。而且,作为既定社会道德文化源头的道德理论,也是在道德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如孔子的“政教合一”思想就是对周公的推崇与效法。所以,道德观与道德文化是相互生成、共存共荣的,社会的道德控制要两者兼顾、相互促进。

第三,道德观在现实化为道德文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异,可能使原本的道德观面目全非。道德文化是道德观现实化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并不像建筑图与建筑物那样一一对应,而是两者之间或多或少有所出入。当然,两者的出入有大有小。欧洲中世纪的道德文化源自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道德观,但最终与之相去甚远。例如,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所有的诫命,如“不可奸淫”(《圣经·马太福音》5:27,《圣经·罗马书》13:9)以及一些特别的劝导,唯有在人们将爱上上帝并因上帝而爱邻舍作为动机原则时,才能得到正确的实行。这个道理在此生、永生中均适用^[6](P115)。然而,中世纪教会对于异端实行残酷打击,对异教进行灭绝人性的征讨,最典型的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9次十字军东征。这可以说是道德观与道德文化之间面目全非关系的典型表现。之所以会出现道德文化与道德观偏离甚至背离的情况,是因为道德观通常是理论形态,要使理论见诸现实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到社会治理者意图和意志的影响。道德化变异后就会将原来的道德观转变为一种不同于原来作为依据的道德观实际奉行的道德观。前面所说的中世纪实际奉行的道德观,已经不再是地道的奥古斯丁提供的道德观。

第四,对于个人来说,道德文化是个人道德观形成的土壤,而不是个人作用的结果。前文谈到,作为现实化为道德文化的道德观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而不是某个人的道德观。就单个人而言,道德文化是其道德观生成和发展作用的环境和条件,没有道德教育、道德褒贬、道德奖惩、道德环境等道德文化要求,个人的道德观就是无源之水。不可否认,社会的道德观是由个人的道德观构成的,但道德文化并不是个人道德观的总和,而是社会中或多或少接受主导道德观影响的那些人道德观的总和。而且,这种总和只是道德文化的一个部分,属于心态道德文化,道德文化还包括如前所说的物态、制度、行为方面的道德文化。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社会的道德文化状况如何,其是否正确、是否先进、是否积极,对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观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这也许是爱尔维修把作为道德文化基本要素的教育(主要是指道德教育)视作万能的原因,他宣称“我们是给予青年人一些明确的、健全的道德观念的”,“是可以使这一方面的教育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的”^[7](P551)。

二、道德文化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7世纪的欧洲,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8]。这两次觉醒都是指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人类意识到了文化包括道德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因为意识到道德文化的重要性,人类社会才开始有了道德文化建设。需要注意的是,道德文化建设与道德文化和道德建设都不是一回事,道德文化和道德建设事实上都从道德诞生时就已经有了,氏族公社对图腾的选择和确立就是最早的道德建设,也形成了最早的文化。但是,道德文化建设则是很晚以后的事,应是在轴心时代以后。从知识查阅情况看,“道德文化建设”一词在我国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而且是与思想相联系的,即“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央确定,把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9]。到此时,“思想道德文化”就成为在我国得到普遍认同的概念。

那么,道德文化对人类和社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或意义,这是我们讨论道德文化问题绕不开的前

提,需要加以阐明。道德文化的意义体现在很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有对人类更好生存的意义,对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生成及运行的意义,对精神文明的意义。

首先,道德文化对于人类更好生存具有极其重要性。前文已指出,道德的价值取向是善,追求的是至善,因此,道德文化是求善的文化,完善的道德文化是追求至善的文化。善是道德文化的特性,向善、尚善、识善、求善、守善、扬善是道德文化的实质意涵。什么是善?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真正善的事物是有益于人生存发展的事情,真正恶的事物就是有害于人生存发展的事情”^[1](P56)。这里所说的事情主要指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及其动机和结果,个人的情感、意志、品质、人格乃至人;这里所说的人是指他者,包括他人、组织群体(家庭、职场等)、基本共同体(当代是国家)、人类整体,也包括道德主体自己。善就是那种具有有利于他者和自己生存发展而无害于他者的性质。这种性质是道德本性的那种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的体现。道德文化是人类道德活动的结果,而道德以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善为价值取向,因此,道德文化作为社会中所有人道德活动的结果和体现,是有利于而且无害于人更好生存的。不可否认,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道德本身发生了异化,作为其结果和体现的道德文化常常是有益于统治者而不利甚至有害于被统治者生存发展的。但是,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否认道德文化的那种有利于而无害于人类的本性。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道德文化的异化正是今天世界各国必须通过道德治理予以纠正的。

道德文化之有利于人类更好生存,是道德文化所具有的那种以善“化”人的功能决定的。文化的本义在于“以文化人”,道德文化的特殊性则在于它的“文”就是道德所追求的善,它的“化”则是善化,即使社会中所有人都崇尚善、追求善,使一切可善化的事物都成为善的,说到底就是使人成为善的。所有人都成为善的意味着什么?第一,所有人独立自主地谋求自己的幸福。一个人成为善的,他就会努力发挥自己的自为性谋求自己更好的生存。其结果即,每一个人只要有可能就会努力去解决生存得更好的问题,社会因此就不会有为很多人提供生存保障的沉重民生负担。第二,人类社会再也没有罪恶和战争。所有人都通过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谋求自己更好的生存,其结果是,国家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就不会发生因争权夺利导致的犯罪和战争。而且因为人们普遍追求互利共赢,社会的公共善(利益)会得到快速增长,社会就能实现物质富有、精神富足的理想状态。第三,所有人都能够获得自由。人的追求不局限于生理欲望的满足,而追求精神欲望的满足,就能够建立自己的精神体系,并从此一切活动都由精神驱动。“只有精神才能使人具有超越性,而只有具有超越性才是自由的真正体现”^[10]。

其次,道德文化可以为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提供环境、滋养和动力。道德像其他事物一样不是孤独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之中。道德文化首先是社会道德生成和存在的环境。虽然一个社会道德总是由该社会的建立者创设的,但它总有一定的先前道德文化环境作为前提,然后再构建新的道德文化。当然,以前道德文化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但不管是哪种影响,都会作为新道德文化生成的环境。可以说,旧道德文化是新道德文化生长的土壤。不仅如此,旧道德文化中或多或少包含对新道德文化构建有用的合理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使新建立的道德植根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之中。有研究认为,当代中国道德的真实集体主义经历了整体主义、虚幻的集体主义两个阶段^[11]。相对于传统集体主义而言,虽然真实集体主义有着无比的先进性与精神超越性,但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滋养和借鉴应是无可否定的。即使是作为社会道德运行结果的道德文化,也有社会道德建设需要汲取的有益因素。因为虽然道德文化是社会道德运行的结果,但社会道德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会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从而会包含一些对社会道德来说是新鲜的营养;也因为道德文化是社会道德和现实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所以这种结果的好坏(常常体现为社会风气的好坏)可以促进社会治理者加强道德治理,从而使社会道德得到改进和完善。

道德文化对社会道德的意义不那么明显,因为社会道德创设和治理与道德文化是一体性的。相对而言,道德文化对个人的意义则不仅十分明显,而且至关重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原

初道德素质是在道德文化环境中自发形成的。人一出生就进入了道德文化环境中,沐浴其光辉。在成为道德主体之前,个人在道德文化环境中会受亲人、老师、朋辈的影响,形成最初的道德观念(如善恶观念)、道德知识(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道德能力(如善恶判断能力)和道德品质(如善良、诚实)。这一切构成了人作为社会成员生活的起码道德素质,在教育落后的传统中,绝大多数人终生都以这种道德素质为人处世。二是个人的道德觉醒与道德文化关系密切。道德文化可以叩击人本性中的道德潜能,增强人作为人的自信和尊严。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氛围浓烈,其成员就会更早地感知到道德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自觉进行道德修为。中国儒家前后跨越了两千多年,已真正形成了伦理共同体,一直到现在仍然塑造与指导着中国人的精神。这种伦理共同体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文化,它从古至今不断发挥着唤醒中国人道德意识的作用,使中国以崇尚道德闻名于世。三是个人可以自觉地从道德文化中汲取营养,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文化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浸染力,道德文化作为一种求善文化更是如此。一个人可以在学校接受道德的基本观念和知识,但在今天的数智时代,道德文化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媒体随时地影响个人,个人可以从中吸收学校没有学过的道德知识、观念和方法,可以更新原来学过的内容,可以增强青年的道德定力,从而提升自己的道德综合素质。四是道德文化可以给人提供道德示范,促使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如同一定的文化系统中总有一些文化精英一样,道德文化体系中也会有一些道德楷模,他们是道德文化达到最高水平的标志,可以对全社会起到道德示范的作用,因此,以道德楷模作道德示范是古今道德治理的重要方式。

最后,道德文化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底色和意涵。道德文化是道德观念的对象化,道德文化的对象化则是道德文明^①。这就涉及道德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中,精神文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精神文明是仅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的,狭义的精神文明主要是相对于诸多文明而言的,如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无论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还是相对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而言,道德文明都不仅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作为道德文明现实化的道德文化,历史悠久,现实化为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生态文化都是从道德文化中衍生的。道德文化及其文明出现在文明社会,而且脱胎于古老的道德文化及其文明;生态文化及其文明虽最早可追溯到轴心时代,却是到了现代由于生态危机的发生才凸显出来的,比政治文化及其文明要晚很多^②,因而说道德文化及文明是社会精神文化及文明的母体和酵母,是能够成立的。其二,作为道德观的现实化,道德文化是道德本性要求的体现,而精神文明是道德本性要求在文明社会的体现。道德的本性在于社会成员通过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谋求自己生存得更好。其中,谋求生活得更好是人类共同本性,而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是道德的本性。政治文明的本性也好,生态文明的本性也好,乃至包括物质文明在内的整个社会文明,归根到底是道德本性即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在政治领域和生态领域的延伸和应用。例如,政治的本性在于人民性,即人民统治和治理社会,具体体现为“作为社会主权者的人民,为了自身的幸福,运用法律统治社会,并授权其代表在法律范围内依据法律治理社会”^[12](P78)。显然,体现政治本性的政治文化及文明,是要通过政治的途径保护社会成员都通过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谈的道德文化的意义指的是道德文化的应然意义,不是其实际意义。道德自诞生开始就在造就道德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于原本其主体是社会中有所有人的道德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变成了阶级道德,故其道德观属于统治阶级,尽管也具有某种全人类性因素,但最终指向的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实现。这种道德观现实化的道德文化不可能具有道德文化的本应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有不少关于道德阶级性与全人类性关系问题的讨论,总的倾向是强调其全人类性。什么是

① 在国内伦理学界,道德文化与道德文明常常并没有严格区别开来。

② 在我国,生态文明问题的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

道德的全人类性? 有学者认为, 道德的全人类性指的是“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内的社会公德”^[13]。显然, 公德只是道德中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全人类性不可能使整个道德具有全人类性。这里所谈的道德文化的意义, 指的是那种超越阶级利益的、真正体现道德本性的道德观现实化后所具有的对于人类的意义。正因为道德文化今天应该具有而没有具有或没有充分具有这种意义, 改造这种道德文化、建设新道德文化就成为社会道德控制的重要任务。

三、道德文化的先进性

谈到文化, 人们通常认为存在着其是否先进的先进性问题, 或者说, 文化有先进性与落后性之别。有学者提出文化先进性的“认知参考系”这一概念, 认为判定文化先进与否的认知参照系是复合的: 该文化所产生和依存的经济水平是一般参照系, 该文化对特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是特殊参照系, 该文化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利害关系是价值参照系, 该文化同科学发展前沿理论成果的关系是科学理性参照系^[14]。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值得我们在讨论道德文化先进性时参考。笔者曾经阐述过价值文化的先进性问题, 提出当代最先进的价值文化是集人类优秀价值文化之大成的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文化: “当代先进价值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建共享的民主文化, 它的主体是人民, 人民是价值文化的创制者、建设者、享有者。当代先进的价值文化是以社会成员幸福普遍实现为终极价值追求并被法制化的完整价值体系, 是谋求社会成员普遍幸福的幸福文化。它能充分体现社会成员根本的和总体的利益, 能最好地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它是顺应人性的, 是人性化、人道化的, 是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亲和力的。同时, 先进的价值文化还能在引导和控制其他价值文化的同时与之共存共荣, 它具有宏大的气魄和博大的胸怀, 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自我完善性, 是具有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主流文化。”^[15]笔者明确提出, 价值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内容, 因此, 其先进性也是社会文化先进性的本质规定。道德文化属于价值文化的范围, 也可以说是价值文化的核心内容, 但有其特殊性。在这里, 我们需要在价值文化的共性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道德文化先进性的真理性和时代性问题。

上述主张建立文化先进性认知参考系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讨论文化(包括道德文化)的先进性问题必须考虑其“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利害关系”, 或是否“充分体现社会成员根本的和总体的利益, 能最好地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因为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即使它们提出了文化的先进性在于人民性这一根本标准, 也不能证明这种先进性具有真理性。道德文化像文化一样, 其先进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在与当代世界各国文化的比较中具有先进性, 而是主要体现为其人民性, 更在于这种人民性为什么是先进的。这就涉及道德文化的先进性与其真理性的关系问题。一般地说, 道德文化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在于其真理性。如果说一种道德文化是先进的, 但它不是真理, 这种道德文化就不能说是真正先进的; 或者说, 我们提出一种道德文化先进性的标准, 其中不包含真理性作为其根据, 那这种标准就值得质疑。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 道德文化的先进性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真理性标准, 另一个是时代性标准; 前者是从道德文化是否体现道德本性的角度看的, 后者是从道德文化是否体现时代精神的角度看的。

在我国学术界曾广泛地讨论过文化的先进性, 但未见涉及文化的真理性。从知网上查阅, 只发现一篇文章讨论优秀文化的真理性 and 道义性问题。该文章对文化的这两性作了这样的阐述: “凡有生命力的文化, 都契合真善美, 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特点, 因此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就是优秀文化的基本标准。合规律性的文化就是真理性文化, 合目的性的文化就是道义性文化, 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文化就是美的文化, 亦即优秀文化必然符合真理性 and 道义性。”^[16]这种观点不仅有创新性, 而且具有深刻性。今天我国广泛谈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但较少有学者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理性和道义性问题, 这也是多年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问题存在的一个重大缺憾。从这个角度看, 上述这篇文章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里所说的“优秀文化”指的是文化本身的品质, 并不包括时代性的含义。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来说,其优秀性的确都应具有真理性和道义性这两种属性;不过对道德文化来说,道义性就是它固有的属性,不具有道义性的道德文化称不上道德文化。

如果我们承认道德文化是文化,就需要讨论道德文化的真理性何在以及它为什么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以上所引文章认为,文化的真理性在于文化具有合规律性,这无疑是正确的。那么,对于道德文化而言,它合乎什么样的规律时才具有真理性呢?无疑是合乎道德规律。这里所说的道德规律在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中通常称为道德法则。

关于道德法则是什么,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角度作了阐述,认为它只是在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关系方面确立物质生活的基础地位,人们从经济状况中吸取道德的过程是一个主体对外部世界即客体的感性活动和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能动反映过程,道德生活中的经济必然性只有通过人们在道德生活中扬善抑恶的斗争方能实现。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关于道德法则的观点。这里阐述的其实不是道德法则是什么,而是道德法则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这一阐述还忽视了道德法则与道德本性、人类本性的关系。

从中西道德哲学史看,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道德法则,其中有些是基本道德法则,有些是派生法则,后者由前者派生并受其制约。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孔子的“仁爱”原则^①、边沁和约翰·密尔的“最大幸福”原则、康德的“形式立法”原则、当代中国伦理学的“集体主义”,等等,都可以视为他们确定的基本道德法则。既然哲学家对道德法则众说纷纭,那究竟有没有客观存在的道德法则呢?无疑是有的,这就是道德本性的要求,而道德本性来自人类本性。笔者将人类本性理解为谋求生存得更好(幸福),认为它是“由谋求生存得更好的各种潜在特性构成的统一整体”^[17](P148)。人类本性隐含着对道德的要求,如果没有这种要求,人类本性就不可能在所有人那里得到实现。这种道德要求在于,每一个人都应通过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谋求自己的幸福。这种人类本性隐含的道德要求,就是道德的本性,这种道德本性的要求就是道德的基本法则。概括地说,道德的基本法则就是每一个道德主体都要在谋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这里的道德主体不仅指个人,也指社会群体。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不同,自然法则是必然法则,道德法则是应然法则。康德的形式立法原则“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行动”^[18](P428)就是一条法则,其中的“要”就是应然要求,不是必然要求。

道德文化的真理性在于,它是上述道德法则要求的体现,体现了道德法则要求的道德文化就具有了真理性。但是,道德文化并不是直接源自道德法则,而是通过道德观来获得和体现道德法则的。道德文化是社会道德观的体现或现实化,只有道德观体现了道德法则的要求,道德文化才会体现道德法则的要求。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要使道德文化具有真理性,就必须确立那种具有真理性的道德观。真理性的道德观在现实化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影响因素和复杂环节,利用好这些因素,把握好每一个环节,真理性的道德观才会转化为现实的道德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社会治理者,社会治理者是道德文化能否实现真理性的关键。道德文化的真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恒久性、同一性,这是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先进道德文化都具备的属性。那是什么才使不同时代道德文化的先进性区别开来了呢?是道德文化的时代性。何谓时代性?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对时代性作了这样的界定:“所谓时代性,是指人们只能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语境中进行哲学思考。”^[19]这里说的是哲学的时代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时代性。我国学界曾存在一种现象,即人们经常使用同一个语词,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大家都只是在某种大致的意思上使用它。从一般意义上看,时代性是指某个人为事物体现或具备的某个特定时代的本质特性或特征。时代性的主体只会是人为事物,不会是自然事物。比如,我们可以说一部艺术作品有时代性、生产力有时代性,但不能说太阳系有时代性、月球有时

^① 孔子的基本道德法则应是多维的,如“中庸”“忠恕之道”等,相比较而言,“仁爱”更具有根本性。这是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仁爱”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代性。这里所说的“特定时代”,是一个十分含糊的语词,可以指历史上不同的朝代,如中国的先秦;可以指马克思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时期,如资本主义社会所在的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可以以产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突出特征来标志时代,如传统社会的农业时代、当代社会的数字时代等。这些时代都有自己的本质特性,比如,数智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数据驱动与智能赋能,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智能技术重构生产生活和社会运行逻辑。某种人为事物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时代本质特征,它就具有了时代性。就道德文化而言,其时代性具体体现为道德文化可以为社会普遍认同,沐浴其中的社会成员乐于将其蕴含的道德要求转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和水平。道德的时代性主要是依据社会形态而言的,就当代而言,有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文化的时代性、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文化的时代性。道德文化的时代性指的是道德文化体现的某个特定时代的本质特征。比如,今天的资本主义道德文化就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即利益最大化和精神宗教化。

具备时代性并不意味着道德文化就具有先进性。从人类历史看,不同时代主流的道德文化基本上都具有时代性。比如,中国汉代开始的以纲常伦理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文化就体现了皇权专制时代的集权、专制、等级制等主要特征^①。但是,具有时代性的道德文化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有些人曾经因中国皇权专制时代的道德文化比欧洲中世纪的道德文化具有进步性而认为它是先进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为一种社会形态物质文明发达就断定其道德文化先进。道德文化的先进性确实必须具备时代性,但时代性并不是其充分条件,其充分条件是真理性+时代性。这里的“真理性+时代性”是指道德文化的真理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将作为道德法则的要求(要在谋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无损于且有益于他者)同特定社会的具体实际(包括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为社会的道德观(理论观念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观具体化为道德文化,那么这种道德文化就具有先进性,就是先进的道德文化。这样的先进道德文化因既有真理性又有时代性,故而本身就具有了广泛性,能够得到社会成员普遍的认同和赞同,从而成为社会成员普遍道德化的优越环境、丰厚滋养和强劲动力。我国学术界曾经讨论过道德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关系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真正先进的道德及其文化本身就具有广泛性。如果一种道德文化不具有广泛性,它就谈不上是先进的。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道德文化,那么同一时代不同社会的道德文化就有可能都是先进的,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说,同一社会形态的道德文化不会是清一色的,而是多样化的,整个世界不同社会形态的道德文化就是多样性的统一。但这种多样性不同于多元性,不同社会的先进道德文化只是多样的,而不是多元的,它们具有统一性。道德文化的统一性源自其对道德法则的体现,其多样性是由特殊社会形态的具体实际决定的。近代以来,伴随着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观察到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文明形态,于是一些学者得出“文化和文明是多元的”结论。既然文化是多元的,道德文化自然也会是多元的。从历史和现实看,不同社会形态有性质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道德文化,整个世界呈现出道德文化多元的格局。然而,如果承认道德文化存在先进性,那么一切先进的道德文化都是性质相同的,只是呈现的形态不同而已,这种不同的形态是道德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道德文化的多元性。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道德文化,这是事实,但这种事实状态并不是道德文化的应然状况,道德文化的应然状况是具有先进性这种统一性的多样性道德文化。虽然今天世界的道德文化是多元的,但随着世界共同体时代的到来,这种道德文化的多元格局将会为统一性和多样性提供一个统一的先进的道德文化取向,今天的人类的基本共同体正在从国家走向世界^[20]。

真理性和时代性是道德文化先进性的基本意涵,也是确证一种道德文化是否先进的标准。确立这两条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社会治理者可以根据这两条标准考察历史上各种道德文化形

^① 有学者强调,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立体结构,这固然是对的,但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皇权专制时代的道德文化的专制性本质特征。

态是否先进,并根据这种考察作出评价。任何社会都有必要作出这种评价。有了这种评价就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为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服务。当代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道德文化形态,一个社会就可以根据真理性和时代性来衡量它们是否先进,从而向先进学习,从落后那里汲取教训。另一方面,社会治理者也可以根据这两条标准审视自己社会的道德文化的先进性状况,并根据审视结果改进和完善自己社会的时代道德文化,以使之更加先进。

四、道德文化生成的根源:道德控制

道德文化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社会道德控制的结果,如果不对它加以反思,它似乎就是一种自然状态。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没有意识到道德文化本身可以通过道德控制来进行控制,社会只管道德控制,不管它的后果,即道德文化。后来,伴随着人类文化意识的增强,也意识到了道德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就有了今天所说的文化建设以及道德文化建设,于是“道德文化建设”概念出现在了20世纪90年代^[21]。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未见有“文化建设”“道德文化建设”的说法,这也许反映出西方国家接受了自由主义国家的道德中立主张。为了了解道德文化与道德控制的关系,我们可以考察人类文化的历史演进。

关于文化的起源,学界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群体也会出现新的提高适宜度的行为变异,这种变异通过社会学习进行传播,并得以继承,这就是文化。不过,人类文化有着自己显著的独特性,它丰富且复杂的形式是其他物种的文化无法比拟的。也许动物的文化可以发生可以传递,但它们的文化不像人类那样可以积累,并且可以将经过修正的、具有良好适宜度的行为模式代代相传。人类文化具有两个不同于动物文化的特点,一是“积累文化演变”(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二是合作与语言符号。人类高级的文化认知能力是形成这种特殊文化的关键。这种观点也许学界许多学者不能接受,因为至少在中国学界,相当多的学者将文化理解为“以文化人”,这里所说的“文”指的是人文,这是动物不可能具有的。但是,根据这一观点倒是能使我们认定,文化是与人类一起诞生的,而且始终是与人类相伴随的。只不过在氏族公社之前,人类应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因为人类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生成史,一直到氏族公社出现时,人类文化才真正诞生。到这个时候,不仅人类已经经历了几百万年的“积累文化演变”,而且合作与语言符号也相当发达。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化人”的“文”,这种“文”就是以图腾和禁忌为主要标志的道德体系。在此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由于道德没有诞生,体系没有出现,即使有文化,也没有道德文化,只有习俗文化,用来“化人”的是习俗,而不是道德。

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类脱离动物界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转变:第一次是从动物的无文化状态走向人类的有文化状态;第二次是从原始人群的习俗文化状态走向道德文化状态。自道德在氏族公社诞生开始,道德就取代习俗成为文化的实质意涵。用道德文化取代习俗文化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变革,它标志着人类从猿到人走过了最后一步。爱德华·泰勒根据他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更加深入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可以看作是通过个人和整个社会的高级组织为了同时促进人的道德、力量和幸福的发展而普遍地改进人类。”^[22](P19)

从这两次转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道德文化虽然是在人类文化史上后来形成的,但它是人类文化形成的标志;第二,道德文化是当时精神文化的主导形式,“原始道德便是在‘风俗的统治’中,与其他精神现象共同发挥干预社会生活的功能,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23];第三,道德文化是道德体系的体现,这种体系包括规范行为(禁忌)和引导追求(图腾)两个有机统一的方面;第四,道德文化背后的道德体系是当时社会道德观的体现,而思想观念上的道德观和实际发生作用的道德体系,都是社会治理者为了实行社会治理构建的,这方面的社会治理其实就是道德治理,“体现了原始道德观念中的公共意志”^[24]。根据以上四个结论,我们可以认为,氏族社会的道德文化是道德治理的产物。不过,那时既没有

“道德”和“文化”的概念,更没有“道德治理”的概念,但氏族公社的首领是实实在在地采取了道德治理的形式,也确实实地形成了原始社会的道德文化。

进入文明社会,道德文化与道德控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始社会的道德文化是道德控制的结果,文明社会的道德文化则因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几千年来出现了三种主要情形:其一,基本上是与原始社会一样的,道德文化是道德控制的结果;其二,社会实行道德控制,但社会的道德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主导道德文化不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其三,社会不实行道德控制,社会仍然有主流道德文化,对社会成员的道德生成和存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是第一种情形的典型形式。进入氏族社会之后,中国只有三国、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五代十国和辽宋夏金等几个相对较短的时期是分裂的^①,其他大多数朝代都是统一的。中国从进入文明的门槛时期即尧舜禹时代,就开始注重对社会实行道德控制,在此后的统一时期国家统治都注重实行德治,规制形式是礼,因而德治也可以说是礼治。中国在实行礼治的同时也实行法治,但这种法是刑法,主要针对百姓,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夏商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并无理论根据,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第一次给德治和礼治的至关重要性提供了论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这段话成为后世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实行德治和礼治的理论依据。实行德治和礼治并不排除法治,但法治不仅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刑法的条文来自礼制的规范,这就是著名的“以礼入法”或“以礼援法”^[25](P153-155)。正是因为社会主要实行德治和礼治这种两位一体的治理形式,所以中国的道德文化不仅完全是实行这种治理方式的结果,而且也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深厚的道德文化的特色。冯天瑜先生将其称为伦理型文化。

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是第二种情形的典型形式。大约从15世纪初到17世纪末长达300年的文艺复兴时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这个时间西欧已经四分五裂,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会完全丧失了对西欧的绝对掌控,不少国家的一些地区逐渐摆脱了教会的统治,罗马教廷连共主的名义都没有;另一方面,在这种教会统治分崩离析的情况下,罗马教廷仍然实行宗教性的道德控制,但其道德控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即使在教会统治的地区亦如此,这样就形成了道德和道德文化多元化的格局。总体上看,当时主要有六种道德观流行:第一种是中世纪的传统道德观,即基督教的宗教性道德观,它以追求死后进入天堂为终极目的,以培养“信望爱”三大神学德性为主要致福途径;第二种是快乐主义道德观,它主张复兴古希腊的快乐主义,主张尊重人的价值和现世幸福,把个性解放、随心所欲、欲望满足作为人生的追求,这是当时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主张和奉行的道德观;第三种是以马基雅维里主张的非道德主义道德观,强调为了达到正当的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把政治善置于道德善之上”^[26];第四种是利己主义道德观,把利己视为合理的、道德的,主张合理利己,即无损于人的利己,这种道德观在后来的霍布斯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达;第五种是新教伦理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把人从事职业视为上帝赋予人的使命,相信金钱至上,崇尚勤劳致富、节制欲望,追求占有更多财富;第六种是空想社会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大多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主张平等互助,相亲相爱,劳动光荣,追求人人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除以上六种道德观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实际奉行的极端利己主义道德观。这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特有的道德观,最著名的表达就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道德观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人间喜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文艺复兴时期道德及其文化的这种格局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种道德文化多元的格局是社会道德控制失灵导致的,其后果是社会陷入大混乱。一般而言,道德文化多元是社会动乱的结果,同时又会成为社会进一步动乱的原因。

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是第三种情形的典型形式。这种情形与第二种情形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不是社会治理者丧失了道德治理能力,而是社会治理者主动放弃道德治理。西方自由主义者为了使整个社

^①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割据,但国家有共主,因而这段时期仍然被划入周朝。

会生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给人们最大限度的自由,限制国家以各种理由干预个人生活,提出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国家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益事业之外,不谋求公共善,不干预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让他们通过自由竞争谋求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幸福。“既然人们在最好生活方式的问题上各有不同的主张,政府就不应该在法律上支持任何一种特定的良善生活观。相反,政府应该提供一种权利框架,把人们尊为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价值与目标的自由且独立的自我。”^[27](P4)在桑德尔看来,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主张是对古典哲学家强调公民应具备社会共同体所需德性主张的背叛,因为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而人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政治共同体的确立应以高尚的行为为目的,而不是单单为了共同的生活”^[28](P92)。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接受了自由主义者国家道德中立的主张,放弃了社会道德治理,专注于国家治理,因此,也就没有国家确立的道德观,没有作为其体现的道德文化。但是,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道德而存在,西方放弃社会道德的结果是出现了两种道德互补的格局:一是道德的规范行为为功利主义道德垄断,对人们行为实际发生规范作用的是法律;二是道德的引导追求方面被宗教道德观控制,这就是在天主教统治被推翻后西方国家基督教等宗教道德普遍流行的重要原因。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无宗教归属的人在2009年为17%,而到2019年有所增加,但只占总人口的26%,这意味着美国今天大多数仍然信奉宗教道德观。

虽然道德控制与道德文化的关系在历史上呈现出以上三种不同的情形,但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是,社会的道德文化应成为社会控制道德的结果,只有以正确的道德观为依据实行道德控制,才能形成先进的道德文化。社会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共同体,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过上好生活,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协调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增强社会的整体福利,为其成员的幸福创造条件,简言之,需要社会治理,需要代表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治理的专门机构^[12](P94)。这种治理就是政治治理,包括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两种基本形式,而道德治理更具有根本性和深刻性。道德治理所形成的道德文化是社会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母体和酵母。

(后记:2025年12月20日,江老师因病不幸逝世,我悲痛万分。江老师生前曾与我讨论过一个吉登斯式的问题:“何为‘善’,如何在自由与风险并存的世界中实现‘善的生活’?”我们最后的结论回归到江老师在《伦理学原理》中的一句话:“善就是那种具有有利于他人、组织群体、基本共同体、人类整体等所有社会主体自身生存发展的性质,恶则是那种具有有害于所有社会主体生存发展的性质。”江老师走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老师联系我,商议《正确理解道德文化》一文的修改发表事宜。衷心感谢编辑老师的细致工作和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同时也感谢江老师的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吴峰鑫老师给予的诸多鼓励和支持,使这篇文章顺利刊发出来。赛尚琪谨识)

参考文献

- [1] 江畅. 伦理学原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 [2] 夏伟东. 论道德文化的承接.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9, (6).
- [3] 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4] 孙春晨. 儒家礼制与当代中国法治. 山东社会科学, 2015, (12).
- [5] 江畅文集: 第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6] 奥古斯丁. 论信望爱. 许一新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7] 爱尔维修. 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8] 张昭军. 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 光明日报, 2012-11-22.
- [9]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 必须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 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的保证——中央确定把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美术, 1996, (4).
- [10] 江畅, 李累. 精神与自由.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

- [11] 徐椿梁, 黄明理. 集体主义存在的历史嬗变. 探索, 2013, (5).
- [12] 江畅. 政治哲学: 理论与历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 [13] 林建初. 试论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 学术月刊, 1980, (6).
- [14] 李凯林. 文化先进性的认知参照系小议.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1, (4).
- [15] 江畅. 论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先进性. 伦理学研究, 2013, (2).
- [16] 王光斌. 论优秀文化的真理性和道义性. 文山学院学报, 2021, (1).
- [17] 江畅. 德性论: 上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 [18] 康德著作全集: 第4卷. 李秋零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9] 宋志明. 论哲学三义与三性.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 (2).
- [20] 江畅. 世界共同体与文明多样性.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3).
- [21] 李友德.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1).
- [22]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 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 连树声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3] 关键. 原始道德诸特征. 民族研究, 1987, (6).
- [24] 聂运伟. 原始社会伦理规范初探.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6).
- [25] 江畅文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26] 范志军. 马基雅维里非道德的德性论.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
- [27] 迈克尔·桑德尔. 民主的不满: 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曹纪茂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28]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9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On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oral Culture

Jiang Chang, Sai Shangq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Moral culture, the virtuous culture that constitute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entire social culture, is the objectific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socially dominant moral outlook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practice, manifested in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moral mentality, moral behaviors, moral systems and moral states. Moral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human survival, the generation and operation of social morali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t may also provide rich nutrients for personal moral cultivation, making it a defining feature of soci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even the entire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advanced nature of moral culture is reflected in its truthfulness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ts truthfulness rationality lies in that it reflects the requirements of moral laws, namely, every moral subject should be harmless and beneficial to others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ir own happiness; while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refers to the essential m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specific era that are permeated and pervaded by moral culture, which, to be more specific, means that moral culture can be universally accepted by society, and social members are willing to transform the moral requirements into their own moral beliefs. Moral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social moral control, and only by implementing moral control based on correct moral outlook can an advanced moral culture be formed.

Key words moral culture; moral outlook; advanced nature of moral culture; moral principles; moral control

-
- 作者简介 江 畅(1957-2025),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9; 赛尚琪,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